

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澳门（1921—1950）

罗燕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新中国的港澳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同时期港澳政策发展变化的结果。本文概述了这一演变过程。大革命时期，香港被视为革命的中心城市之一。土地革命前期，香港是成为领导南方武装暴动的指挥中心，后期演变为统战工作的重镇。抗战时期的港澳政策趋于成熟，中共与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在香港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与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为了分化美英，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澳门，引导英国政府选择了承认新中国的对华政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香港；澳门

DOI：10.3969/J.ISSN.1672-0911.2022.04.047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22)04-0047-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对香港澳门地区采取“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政策。后来人们熟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是从前者发展而来。那么，前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港澳政策和相关做法。这些政策和做法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反对英葡统治到承认和利用这种统治的发展。

一、中共港澳工作的起源

中国政府的港澳工作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已有一定基础。香港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可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当时党的工作重点是组织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其活动带有全国性和跨境性。英国占据的香港不仅包括在这一范围内，与上海、武汉、北平、广州等中心城市齐名，而且香港的工人运动一度走在全国前列。

早在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海总）就在香港成立了。这是一家冲破行业束缚以产业联合为基础的现代工会组织。香港海员陈炳生、林伟民、苏兆征等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利用广东的有利形势，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积极筹建了海总。孙中山为海总命名，帮助在广东军政府内政部注册，派代表出席成立大会^[1]。

海总成立两个月即向英国轮船公司提出了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三项要求，遭到英方的无视和拖延。1922年1月，海总发起香港海员大罢工，人数达到3万。工人们封锁了香港，断绝了供应，动员10多万人返回内地生活。罢工坚持了56天，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海总成立正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在陈独秀的鼓励支持下，香港也出现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7月，中共一大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

收稿日期：2022-02-15

作者简介：罗燕明（195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及本所一国两制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引用格式：罗燕明. 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澳门（1921—1950）[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4)：47-55.

业工会”。会后立即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任书记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运的第一个公开合法机构。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半年，基于党的性质，仍全力支持了香港海员的行动。书记部派李启汉专程到香港、广州慰问罢工海员，发动各地工人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斗争，宣传天下工人是一家，阻止港英资方来内地招人顶替，破坏罢工。京奉、京汉、京绥、陇海、正太等地铁路工人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每人捐出一日工资援助香港海员。中共广东支部散发《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达全力支持的立场。

罢工胜利后，李大钊著文指出，“这个胜利固然是依靠了香港海员工会本身的力量”，全国工人阶级“从一切方面即物质的、精神的等等方面所给予的支援也是必不可少的”^[2]。

中国共产党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体现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形成联合力量。香港海员亲身感受到了全国工人天下一家，中国共产党才是工人自己的政党。1922年5月1日，海总领导人林伟民、苏兆征出席了书记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他们原是国民党员，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的影响。二是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国民党成分复杂，陈炯明等右派并不真心赞同罢工，期待与英妥协。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罢工的支持使孙中山认识到国共合作可以压制党内右派。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劳大在广州召开，海总是发起团体之一。大会通过了《香港问题决议案》，提出“从新组织全港工会的总机关，务使所有工会统一，集中工会力量，为全港民族的和阶级的利益及幸福而奋斗”^[3]。大会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成立。林伟民、苏兆征当选全总执委。两人先后担任了执委会的委员长。

全总成立后为响应和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

国运动，于1925年6月组织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这是中共领导的一次政治性罢工，矛头指向香港和广州沙面租界的英国当局和英资企业。罢工者包括两地的中国工人，约25万之众，香港工人为多，且多为产业工人。罢工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四个月。

中共中央在广东的临时委员会和广东区执委成立了罢工党团，派出邓中夏、杨殷前往香港。当时香港的中共党员不满十人，团员也不多。他们一面动员工人群众奋起，一面与各工会组织磋商，取得一致后，组成了“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罢工行动的指挥机构。6月19日，罢工在香港首先爆发。随着沙面洋务工人的加入，省港大罢工全面展开。6月23日，英法军警武力阻拦香港工人返回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抗议。

为了反击英帝挑衅，全总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苏兆征亲兼委员长。委员包括林伟民、李森等13人。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等为顾问。7月10日，全总宣布封锁香港。封锁长达15个月。省港省澳的交通、物流全断。香港变成了“臭港”“饿港”“死港”，有力打击了英帝气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香港工人阶级在省港大罢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广州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成立，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罢工工友们积极参加了北伐。他们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师北伐，给予北伐军巨大的帮助，推动大革命进入高潮。经过省港大罢工，中共也从“由400人的小团体一变而为上万数的真正群众的政党”^[4]。

省港大罢工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极度恐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同年10月，汪精卫返回广州，武力取消了省港大罢工。

二、港澳与土地革命

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始于苏维埃运动时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的工作重点从城乡民众运动转向武装暴动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在

中心城市上海领导全国农村土地革命，后又移到江西中央苏区领导这项工作。在此背景下，香港扮演的革命角色发生了改变，从全国工运中心之一变为党的地下工作的场所。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香港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一旦党的领导机关在内地难以立足，就会把香港当作临时避难所和面向内地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央南方局、南方工委、中共广东省委、两广省委、广州市委及其下属机关都曾落脚香港。中共不再把香港视为反帝斗争的前沿阵地，而是利用港英统治很难深入港人社会的弱点，开展服务于武装斗争的地下工作。

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是最早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中共领导机关。1927年，广州继上海之后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广东地方党组织猝不及防，遭受重大损失。4月17日，秘书长赖玉润召集了区执委紧急会议，决定区执委机关立即撤往香港。由于主要负责人缺席，区执委进入香港后改为特委，代行原来职责。

这次撤离开辟了党中央利用香港跨境领导华南武装斗争的先河。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成立南方局。南方局设在香港，由周恩来、张太雷等7人组成。由于周恩来正在领导南昌起义，张太雷受中央指派先期抵港，与黄平、杨殷组成临时南方局。8月20日，广东省委正式成立，张太雷任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制定了各县暴动计划和其后的工作大纲，派人分头执行。9月23日，南昌起义军在各县暴动的支持下占领了潮汕地区。赖玉润、张太雷从香港赶来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会合。张太雷向起义军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起义军放弃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帜。这次胜利持续一周，史称“潮汕七日红”。随后起义军作战失利，无法再战。党中央指示南方局在香港等地安排溃散之同志^[5]。周恩来、张国焘、贺龙、叶挺、聂荣臻、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郭沫若、彭湃、叶剑英、陈赓、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张太雷、周逸群等人在广东地方党的安排下撤往香港和澳门。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认为广东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决不能因为叶贺军队失败而取消之”^①。这样，广州起义被提上广东省委的议程。周恩来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住所养病，仍参加了研究起义的省委会议^{[6][129]}。11月下旬，广东省委领导班子和重要干部从香港陆续潜入广州，全力以赴，准备起义。

12月11日凌晨，起义的枪声打响，激战三日，最终失败。省委书记张太雷阵亡，起义军退出广州。周文雍、恽代英、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杨殷、陈郁、吴毅、陈铁军等大批同志被迫再次撤往香港、澳门。

1931年，中共中央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对苏区中央局和白区中央局的任务作了划分。前者专管全国各个苏区。白区各局的任务是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变白区为苏区，再将苏区移交苏区中央局管辖^[7]。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位于香港，面向内地，跨境领导粤、桂、滇、黔、闽白区的武装暴动。香港本地的城市、工运和民众工作则由下属香港市委承担。

从1927年起，南方局多次改组、撤销和重建。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罗登贤、卢永炽先后担任过南方局书记。广东省委相继演化为两广省委、两广工委、香港工委等，领导过广州起义，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中，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8支地区武装，77支县游击队^[8]。1934年8月中共香港工委解体前，香港一直是南方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此外，香港还是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战略筹划的重点。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特科决定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指派第四科科长李强前往执行。李强携电台于年底赴港，在九龙弥敦道选中一所房子作为工作站。此时恰逢邓小平从上海到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途经香港。邓李会面后约定了电台呼号、波长和联络时间。1930年1月，上海党中央与香港南方局之间实行了无线通讯。而香港电台则成为党中央与百色起义部队无线通讯的中转站。李强指出：香港电台的设立“开创了我党通讯工作的

新局面”^[9]。

1930年秋冬，在周恩来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福建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在南方局、广东省委的协助下，一直坚持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重要领导干部共200多人，其中有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刘伯承、博古、瞿秋白、任弼时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等。交通线还秘密地向中央苏区输送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情报以及大批军用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和中央苏区建设。许多报效祖国的海外华侨青年都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和苏区的^[10]。

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苏维埃运动前期，中共对香港的利用还不够到位，没有把统一战线摆在突出地位，也没有争取港英当局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将英美与日本等量齐观。1931年6月，港英当局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逮捕了蔡和森，把他引渡到内地遭到杀害。“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共在白区的力量丧失了几乎百分之百，也使中共在香港的领导机关和党的组织屡遭敌人破坏。

红军长征结束后，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再次赋予香港新的使命。1936年4月，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提出了“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的白区方针^[11]。9月，中共北方局成立了南方临时工委，派遣薛尚实到香港主持重建南方党组织，传达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新的白区工作方针。

香港退出了指挥武装斗争的角色，开始彰显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镇的作用。

三、港澳与抗战

抗战时期，中共大大加强了在香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半公开的合法机构——八路

军驻香港办事处。1937年12月，中共长江局讨论了中央关于加强华侨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的指示，认为香港具有“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位”，旋即派廖承志、潘汉年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香港公开活动^[12]。

周恩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港英当局提出，八路军准备派人到香港接收海外华侨和友人捐助的药品、汽车等抗日物资，成立办事处，不公开挂牌，不影响英方的中立地位^[13]。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得到港英当局默许后成立，地址是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称“粤华公司”，以经营茶叶为掩护。驻港“八办”直属中共长江局。1939年1月，中共中央在重庆重设南方局，驻港“八办”转归南方局领导。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廖承志任“八办”主任兼南方局委员。潘汉年任八路军代表，协助廖承志工作。连任廖承志的秘书，负责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以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公开活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少数从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调来之外，大部分是根据需要由地方党组织派调来的。乔冠华、梁上苑、李默农（李少石）、张唯一、杨琳、林青、李静、康一民、熊志华等人先后在办事处工作过。

驻港“八办”的工作分为交通、联络、宣传、侨务等事项，围绕发展国内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海外和国际援助，组织人员物资的转运，把资金、药品及医疗器械、汽车、通讯器材等境外资源，以及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港澳青年和专业技术人材，不断输送到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仅1938年至1939年两年间，经办事处输送回国前往延安和新四军的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就达600多人^[14]。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由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廖承志兼任秘书长，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诺曼·法朗士教授担任名誉司库，爱泼斯坦先生担任宣传工作。保盟是宋庆龄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建议成立的国际救援机构。成立这个组织也是为了避开国统区，利用香港环境和国际资源支援中国人民的抗

日战争。

为了宣传统战和抗日，驻港“八办”还出版了一些报刊，如《华侨通讯》（油印本）、《抗日大学》等。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向香港转移安置了大批文化界人士。1941年6月，驻港“八办”成立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华商报》《青年知识》《时代文学》《明光报》等抗日进步报刊在香港层出不穷。

驻港“八办”的成立体现了中共港澳政策走向成熟，从反对和破坏英国统治香港转向承认其统治，争取英国政府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在中日冲突中同情中方，推动中共与英美的合作。

港英政府害怕得罪日本，对中共在香港的抗战活动采取监视和限制的政策。1939年3月，在日方压力下，港英出动便衣警察搜查了粤华公司，抓走连贯等5人，还收缴了一些文件。廖承志立即向港督杨慕琦提出抗议，并上报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约见了英国大使卡尔，进行了严正交涉。港英政府很快释放了我方人员，归还了搜走的文件。此事之后，驻港“八办”撤销了粤华公司，“化整为零”，将联络和办公地点分散到多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变成敌占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中央交通处驻港澳办事处处长）接到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要求紧急转移“在港朋友”，将其疏散到澳门、广州湾、桂林、重庆、马来亚等，“少部分能留港者尽量留，但必须符合秘密条件”，“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周恩来特别关照，“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15]。驻港“八办”立即行动起来，动员所有力量，组织了空前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先后将800多人安全送出香港，圆满完成了中央任务，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好评，提高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力。

1942年1月，驻港“八办”奉命撤销。2月，中共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区的军政工作，并在香港开展敌后游击战^[16]。

英军对日本入侵的抵抗仅维持了两周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东江纵队所属港九独立大队成为香港地区唯一的抗日武装。英军只是为保护殖民地而战，而港澳青年组成的港九大队则是从事保家卫国之战。港九大队拥有沙头角、元朗、市区、西贡、大屿山、海上六个中队，总兵力约800人。他们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积极开展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抗日游击战争，神出鬼没地袭击敌寇，惩治汉奸，秘密营救被俘的英军官兵、美军飞行员和遭日军关押的国际友人。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沦陷的3年内，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共营救英国42人，印度54人，丹麦3人，挪威2人，俄国和菲律宾各一人，总共101人^[17]。他们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46年6月随东江纵队主力北撤。

现在香港九龙新界的乌蛟腾和斩竹湾建有两处纪念港九抗日英烈的碑园。1999年10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隆重仪式，纪念1941年至1945年在香港保卫战中捐躯的爱国爱港人士，将港九独立大队115名阵亡人员的名册存放在香港大会堂纪念龛内^[18]。

四、港澳与解放战争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英国与蒋介石争夺香港受降权，占了上风，得以重返香港。中共广东区党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英蒋矛盾，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香港撤出武装力量，同时派出中共代表谭天度与港督代表谈判，促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拥有合法地位，而中共活动不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在谈判中，谭天度向英方指出：“香港、九龙、新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英国靠发动侵略战争及与当时腐败的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攫取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鉴于目前局势和种种原因，我们暂同意英国重占香港，但必须保护中国人民在港利益。”1945年10月双方达成协议。港英政府承认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建立半公开的工作机构，允许我方人员在港九居住、往来、从业及募捐，同意我方在港出版报刊，帮助我方在港设立秘密电台等^[19]。

根据协议，中共东江纵队很快撤出了武装力

量,控制区域由英军接管。撤退时,港九独立大队发表宣言,高度评价了香港同胞的革命爱国主义精神。宣言指出:“我港九人民对于祖国是无限忠诚的,对于敌人是极端仇恨的。三年多的日子,他们虽饱受日寇的屠杀与迫害十分惨重,但他们对我队的帮助与支持却有加无减,他们的斗争实在是可歌可泣。”^[20]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10月攻占张家口,11月召开伪国大。随着国共破裂,中共陆续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撤离党的干部,帮助转移民主党派成员和大批文化工作者,除北上解放区外,相当一部分人员被分流到香港。周恩来在南京、上海先后指派章汉夫、乔冠华、龚澎、刘宁一、许涤新、方卓芬等人专程赴港开辟统战宣传的“二线”阵地。1946年6月,他给香港工委的指示是:“运用英美矛盾,争取长期存在,对英不加刺激,采取适当而有步骤的批评。”^[21]10月29日,他又致中共中央转方方、林平并香港工委电,指出: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而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线工作^{[6]714}。

一时间上海、南京、重庆、北平、延安、广东等各路人马齐聚香港,群英荟萃,共同目标是反蒋。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香港建立,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委员章汉夫、梁广、潘汉年、夏衍、连贯、钱瑛,秘书长饶彰风。香港分局领导整个华南地区的工作,下设香港工委、城市工委和各地党委。城市工委负责地下工作,各地党委负责武装斗争。香港工委专管华南地区和香港等地公开的统战、文化、宣传、外交、经济、华侨、群众和报刊等工作,书记张汉夫,副书记连贯,常务委员有夏衍、许涤新、乔冠华等。在中央、香港分局的领导下,香港工委先后开办或复刊《正报》《华商报》《群众》杂志、《今日中国》外交双周刊、《中国文摘》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英文期刊、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南通讯社、国际新闻香港分社、中国歌剧艺术社等。

不仅中共力量聚集香港,民革、民盟、农工等民主党派也被迫撤离国统区涌向香港,在这里建立

新的总部和恢复关闭了的或遭查封的报刊。香港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结为反蒋统一战线的新中心。1946年10月达德学院开门招生。这是继保盟之后在香港成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统战组织,由中共领导、中共与民主党派合办、民主党派出面主持,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学者任教,任务是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准备干部^[2]。

香港分局成立后再次形成以香港为基地辐射整个华南地区的领导格局,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香港工委负责的统战战线的党员人数1949年达到了3万,他们所联系的文化人才队伍据不完全统计至少达到12万人之多^[3]。全国胜利来临之际,香港工委根据中央和上级指示开始向北方转移输送党的干部和民主人士,计20多批次350多人,其中110人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4]。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香港分局迁往内地解放区,在江西赣州改组为华南分局,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10月14日广州解放,分局机关进驻广州,开始从内地就近领导港澳地区的党组织。此时,中共香港工委改称临时工委,书记张铁生,后黄作梅,委员有黄作梅、吴荻舟^[22]。

五、暂不收回香港澳门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从国内局势和长期全球战略出发,作出了全国胜利后新中国政府暂时不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决策。

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王家坪会见三位西方记者,首次阐述了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当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已5个多月,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取得了歼敌约40个旅的伟大战绩。中共中央就此把政治目标设定为“打倒蒋介石”,提出“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毛泽东就战局的走向、中共取胜的可能以及中共的外交政策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当问到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

解决。”^[23]

1949年2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在西柏坡接待了秘密来访的斯大林特使米高扬。后者的任务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听取中共关于未来安排的意见。毛泽东在介绍情况和表述意见时进一步阐述了暂不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决定和这么做的理由，指出：“目前，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24]

“不急于解决港澳问题”也因为英国政府为保住香港和在华利益，对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采取不干涉的立场。1948年底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内部报告认为：“香港要保持目前的地位，将有赖于中共是否认为香港的存在有利于中共的经济和外贸。”^[25]

但是1949年4月20日，英军紫石英号护卫舰闯入长江战区，与我渡江部队发生冲突，遭重创搁浅，给双方关系带来冲击。英国国内一片哗然，丘吉尔扬言要派两艘航母实行武力报复。毛泽东主席起草了一份声明，严厉斥责英方的罪行和炮舰政策：“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同时向英方指明，解决双方关系和中英建交的唯一出路是：英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26]。声明只字未提英国忧心忡忡的香港问题，控制了事态恶化。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必须避免美国和西方列强出兵，武力干涉中国内战。

6月11日，毛泽东就未来政府组建等问题致信斯大林，在谈到“有关香港和九龙的问题”时指出：“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还归中国的要求。”又说，我军进攻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时，英国、法国和美国一定会在香港、印度支那、缅甸和暹罗加强军事防御措施。但是，我们的部队不打算越过

自己的国境^[27]。

暂不收回香港澳门不是一个公开宣布的政策。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中共中央避免在公开场合正式作出“暂不收回”香港和澳门的承诺或明示，以政策模糊的灵活姿态对英国造成一种无形压力，争取它采取不同于美国而于我有利的政策。

1949年3月16日新华社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和12月31日《中共中央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有意回避了香港澳门问题，强调“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⑤“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⑥。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废除了西方国家强迫中国签订的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各中心城市的租界。但是港澳地区除外，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得以保留下来。蒋介石多次尝试收回香港，甚至动用盟国明确赋予他的香港受降权，均遭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缺乏力量，无论维持反动统治还是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都仰仗美英西方国家的支持。蒋介石不得不在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后又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政府在实质意义上恢复了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人民解放军“只用一个指头”就能把英葡殖民者赶跑。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政府暂时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也不对英葡威胁行使这个权力，力量所在，不怒而威，自不待言。就战略而论，此政策乃出于对中国更为有利的长期考量。所谓“暂时”，实为一项长期政策，不是时间意义的短暂，而是表达中国政府已具备了收回香港澳门的实力，只是暂不行使罢了。这个实力就是主权。

1982年，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收回香港。在为此举行的中英谈判中，为了不给英方“主权换治权”的借口，中国政府不再使用收回香港主权的说法，统一改用“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措

辞，以表达香港主权并不在英国手里。现在中国要求恢复的不是主权，而是治权，“恢复行使主权”之谓也。这是后话。

再回1949年。为了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中国政府当时也没有公开宣布不承认英葡两国对港澳的统治，或声明废除三个不平等条约。至于西方国家要求新中国承担所谓国际义务，中国政府理所当然一律不予理睬。中国政府原则上反对旧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选择的策略却是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对外宣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订，或重订。”

根据这个精神，新中国政府直接废除了国民党政府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5年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一项不平等条约。由于涉及苏联，新中国政府对它作了“重订”处理。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说服斯大林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显然，满清时期中英三个不平等条约和香港澳门问题没有纳入上述处理范围。

此前，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党内作了如下解释：“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28]

由于采取上述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天，英国政府便令原驻北平总领事致函中方，表示

愿与我先建立非正式关系，继续双方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1950年1月6日，英国照会中国，正式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希望与中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

注释：

- ①参见《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4号——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1927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1982年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省委文件）1927》，第86页。
- ②参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送审稿》，第378-379页。
- ③《目前港工委的组织概况》（1949），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1947.5-1949.3），第485页。
- ④李信：《建国前中共在香港的主要活动》，见葛量洪回忆录《百年沧桑论香港——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6月1日）。
- ⑤参见1949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 ⑥参见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 [1]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3册):五四运动前后的工人运动[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569.
- [2]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60.
- [3]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32.
- [4]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M]//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38.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57.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7]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等的指示(1930年8月29日)[M]//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84-385.
- [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第2卷(中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511.

- [9]李强.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M]//中共常熟市委组织部、常熟市档案馆.李强纪念文集.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133.
- [10]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42-143.
- [11]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M]//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4.
- [12]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51.
- [13]连贯.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M]//广东省档案馆.东江纵队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641.
- [14]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之四军事工作[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470.
- [15]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180.
- [1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240-1241.
- [17]曾生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364.
- [18]香港纪念抗日烈士[N].人民日报,1999-10-18.
- [19]谭天度.抗战胜利时我参加的香港中英谈判[J].同舟共进,1997(7):14-17,41.
- [20]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M]//丘孟军.白石龙文钞.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108.
- [21]路剑.新华社香港分社初期的情况及其作用——新华社香港分社筹建者之一、党支部书记杨奇访谈[J].广东党史,2002(1):38-41.
- [22]卢荻.新中国初期叶剑英领导港澳工委工作[J].炎黄春秋,2017(10).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
- [24]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276.
- [25]翟强.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 1949-1954[J].世界历史,1990(6):129-140.
- [2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M]//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85.
- [27]沈志华.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320.
- [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949.1-9)[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4.

(责任编辑:万益)